

汉喃《二十四孝演音》考辨

朱 瑶

内容摘要:汉喃《二十四孝演音》来源于中国《日记故事》系统的二十四孝故事,包括李文馥所翻译的喃文诗歌以及李氏与友人的唱和汉文诗。它创作于阮朝大力推崇儒学的氛围中,在越南社会中起到了启迪童蒙、孝道训诫等作用。

关键词:汉喃《二十四孝演音》 《日记故事》 儒学教育 启蒙及训诫

在中越政治、文化交流中,中国二十四孝故事经越南上层人士的译介而传入越南,被翻译成喃文诗歌而广为流传,并促发一批以此为素材的汉文诗歌的涌现,《二十四孝演音》即其中代表之作。

《二十四孝演音》解题

《二十四孝演音》为阮朝著名文人李文馥所撰,据《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简称《提要》)载录^①,《二十四孝演音》及其相关文献共有六件,兹依据《提要》解题如下:

1、抄本一种,0903《掇拾杂记》^②合抄李文馥所撰五种作品,《二十四孝演音》为第四种。题明命十六年(1835)李文馥序、杜俊大跋,汉喃文对照讲述二十四孝故事,附有李氏与友人的唱和诗文。

2、1813《二十四孝演音》,又名《二十四孝咏》,今存嗣德辛未年(1871)锦文堂印本一种。原附于1857《阳节演义》观文堂成泰庚寅年印本下,与《阳节演义》、《幼学越史四字》、《三千字解音》、《明道家训》合订,有题咏诗。

3、见于1844《劝孝书》中,与《文昌帝君劝孝文》合订。共存八种印本,历次印行于绍治五年(1845)、嗣德二十三年(1870)、嗣德二十四年(1871)。其中有一个印本附载《二十四孝诸公述怀诗》和讲述报应故事的《古录》。

4、收录于1588《驩州风土话》126页抄本末附载之《杂编》中,与副榜邓元谨的《谢亭兰玉赋》、仙田人衡乐伯《吊幸安先生文》等合订。

5、《二十四孝咏》,附于1820杜发撰《孝顺约语》下,抄本,后附陈名案撰《劝子勤学歌》和李文馥其他作品及其演喃。1813解题称《二十四孝演音》又名《二十四孝咏》,二者当属同书异名。

6、《二十四孝歌》,是附于4952《诗文并杂纸》诗文集下的第十一种文献,抄本。《提要》未著录其内容,从题目来看或即《二十四孝演音》、《二十四孝咏》的别称。

从《提要》可知,《二十四孝演音》不仅包含李文馥所作二十四孝喃译诗歌,还包含二十

^① 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编印2002年版。

^② 本文文献编号采用《提要》标记编号。

四孝汉文原文及李氏与友人的唱和诗文。在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位化计划(The Han Nom Special Collection Digitization Project)^①数据库中,有两件越南国家图书馆藏《二十四孝演音》,据此我们得以确切了解其内容。

其一,R.296(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Call Number)抄本,首行题“绍治五年(1845)八月吉日新镌,永顺湖口李邻芝原撰”,每则故事先抄李氏译六八体喃文诗歌,后接写汉文故事,并依次附李文馥、陈秀颖、杜鉴湖以“二十四孝”为素材的题诗及谭镜海和诗。所有故事抄毕,接抄《二十四孝诸公述怀诗》,为李、陈、杜各以一诗抒发此次唱和之感。最后,书末附《感应篇说定云》和《劝孝篇》。

其二,R.1849印本《劝孝书》,题成泰十二年(1900)新刊,包含四部分内容:《文昌帝君劝孝文》、《劝孝篇》、《二十四孝演音》、《古录》。《二十四孝演音》每页分上下栏,上栏为汉文故事及李、陈、杜三人题诗,下栏为喃译诗歌。所有故事抄毕,接抄《二十四孝诸公述怀诗》,末为《二十四孝诗南海谭镜海拜和》二十四首。然文中有缺页,阙“单衣顺母”、“为亲负米”、“鹿乳奉母”、“戏彩娱亲”、“卧冰求鲤”五则故事。

对比这两件文献,R.296中《感应篇说定云》与R.1849中《古录》异名同质,除R.296没有《文昌帝君劝孝文》及R.1849谭镜海和诗二十四首合刻于《二十四孝诸公述怀诗》之后的细微差别,两件文献几乎是相同的。R.296和R.1849的内容构成与《提要》所录1844号文献相同,R.296首题“绍治五年八月吉日新镌,永顺湖口李邻芝原撰”,那么R.296应是据1844所著录之绍治五年印本所抄。综上可知,R.296、R.1849与1844属同一版本系统,但二者并未被《提要》著录,可补提要之阙。通过对这两件文献的考察,我们复原了李文馥翻译“二十四孝”,与陈秀颖、杜鉴湖、谭镜海据此题咏唱和的情景,并明确了《二十四孝演音》的抄印形式及内部各文献间的关系。

《二十四孝演音》的故事来源与传播状况

1、《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

中国二十四孝故事有三个系统:“二十四孝图”、《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日记故事》。^②“二十四孝图”常见于宋金元墓中壁画、砖雕、石棺上,其中虞舜、老莱子等十四个孝子为三个系统所共有,韩伯愈、元觉、刘明达、田真、曹娥、刘殷、鲁义姑、鲍山、赵孝宗、王武子则是其他两个系统中所没有的。元末郭居敬删辑《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将这十个孝子换作汉文帝、唐夫人、吴猛、庾黔娄、黄山谷、朱寿昌、王裒、张孝张礼、田真。《日记故事》以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镌类解官样日记故事大全》^③为代表,将《诗选》系统的田真、张孝张礼换作仲

① 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位化计划:<http://www.nomfoundation.org>。

② 大泽显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论孝子形象的成立与发展》,《明代研究》2002年第5期。其中第一个系统是《孝行录》,因其元末编撰于高丽,不在中国流传,但内容同于宋金元墓中的孝子图,故笔者将其改称为“二十四孝图”系统。

③ 现今流行二十四孝故事与此版本同,即:孝感动天、亲尝汤药、啮指痛心、单衣顺母、为亲负米、鹿乳奉母、戏彩娱亲、卖身葬父、为母埋儿、拾椹供亲、刻木事亲、怀橘遗亲、行庸供母、扇枕温衾、闻雷泣墓、恣蚊饱血、搯虎救亲、卧冰求鲤、哭竹生笋、尝粪忧心、乳姑不息、弃官寻姑、涤亲溺器。

由和江革,并将每个故事的核心内容蕴藏在题目中,成为明万历以后至今最流行的版本。

《二十四孝演音》中有仲由和江革的故事,与《新楔类解官样日记故事大全》卷一《廿四孝》^①故事条目相同,知其本源于《日记故事》系统。然而其中“啮指痛心”较之前者多出了曾参事父的内容,“闻雷泣墓”多出了王裒为父誓不仕魏的内容,知其并不全同于此版本。另有嘉靖壬寅《新刊校正详明日记故事大全》,乃据元代虞韶《小学日记故事》所刊,二十四孝故事散见于各门类之中,为《日记故事》系统的其他形态。以之与《二十四孝演音》相校,其中“门人废诗”^②正与“闻雷泣墓”相同,“酒肉养志”^③讲述了“啮指痛心”中曾子事父的故事。可见,《二十四孝演音》为参照《日记故事》系统不同版本而成。

2、儒学背景

越南受儒家文化浸润较深,早在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之时,儒家文化便通过兴办教育、移风易俗及派驻官员等措施传播到越南。北属时期,中原政府为巩固在越南的统治,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建立学校,导之经义”^④。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列《孝经》为学校的必修科目、举孝察廉以推选官吏,这些措施对越南的儒学教育产生过深入影响。根据《提要》的著录统计,现存汉喃文献中有四种《孝经》的重抄重印本,三种《孝经》喃译本,一种对《孝经》的评论著作,以及大量劝孝书类作品,正是这种影响在文献中的反映。《大越史记全书》载东汉灵帝中平年间越南人李进任交州刺史,请求在交州选拔人才:

进复上疏曰:“所举孝廉,请与十二州之博士,以人才专对。”……以我茂才一人为夏阳令,孝廉为六合令。后李琴任至司隶校尉,张重为金城太守,则我越人才得与汉人同选者,李琴、李进有以开也。^⑤

可见,选拔交州人人仕中原在东汉时已渐成制度。唐朝设立“南选使”^⑥,在越南推行科举制度,将儒学教育导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独立时期,越南统治者沿袭中国教育制度,李朝设立国子监,陈朝创办国学院,将儒学定位为“国学”、“国教”;独立举行科举考试,在形式及内容上完全仿照中国,确保了儒学教育的长久施行。阮朝明命、绍治、嗣德诸帝都亲自研究儒学,规定从幼童入学起就要学习儒家著作,通过学校教育,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百姓;并下令刻印儒家经典,颁布各地,儒学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孝道作为儒家的基本伦理道德,在各时期均得到支持与推广,使越南社会具备了深厚的孝道文化背景。

① 长泽规矩也编《和刻类书集成》(第三辑),第245~3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② 熊大木校注《新刊校正详明日记故事大全》,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第5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同上,第611页。

④ 陈寿:《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第125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⑤ 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士王纪》,第131页,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セソ夕一刊行委员会昭和59年版。

⑥ 王溥:《唐会要》卷七五《南选》,第1369~1370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借助儒学教育的推行,书籍等文化资源得以传入越南。历代中原政府的赐书,都以儒家著作为主。在明代中原政府颁赐给越南的图书中,就有孝子故事的书籍,《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载“黎太祖”:

己亥(1419)春二月,明遣敷生唐羲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于府州县儒学,俾僧学传佛经于僧道司。^①

《孝顺事实》是明太宗朱棣命翰儒侍臣辑录古今史传所载孝顺之事而成,收录孝行卓然可述者207人。这一记载表明,至迟在明朝永乐年间,中国的孝子故事就整体传入了越南。儒学教育的全面推行和孝子故事的广泛流传是二十四孝故事得以在越南传播和接受的基础。

3、李文馥的译介

明清时期,中越外交使臣之间的交流为书籍和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成为《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传入越南的契机。

李文馥在《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入越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据《大南实录·李文馥传》载“文馥有文名,为官屡蹶,复起前后阅三十年。多在洋程效劳,风涛惊恐,云烟变幻,所历非一,辄见于诗。”^②李氏曾多次出使中国,他曾于明命十六年(1835)捕获并押送抢掠于广南海面的三名水匪回广东。《提要》4017号《三之粤杂草》是他此次出使中国所作的诗文集,其中有《咏二十四孝序》^③。陈益源教授认为,在明命十六年的赴粤之行中,李文馥写下了《三之粤集草》、《仙城侣话集》、《二十四孝演歌》等作品^④。据此,李氏当在此次赴粤干时获得了《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故事,为其作了《演歌》。而李文馥《演歌》与陈秀颖、杜鉴湖、谭镜海题诗唱和合写流传的现象表明,他的译介对越南文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入越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十四孝演音》文献类型分析及其在越南的社会作用

1、文献类型

(1)根据使用的文字种类,《二十四孝演音》属于混合本文献^⑤,既有汉文故事及汉文题诗,又有喃译诗歌。

“演音”相当于翻译,“演义”相当于译述和疏解,“演歌”则是改写——把散文改为诗

① 《大越史记全书》,第517页。

② 许文堂、谢奇懿编《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第504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年版。

③ 《提要》,第747页。

④ 陈益源:《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以1830年代初期为考察对象》,《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⑤ 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132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该书根据刊刻书籍的文字种类,将安南本分为:汉文本、喃文本、国语本、混合本四类。

歌、把书本改为说唱、把小说改为戏剧。^①《二十四孝演音》将散文体汉文故事翻译成了“六八”体喃文诗歌,则是三者结合的作品。喃字是用汉字的表音表义功能来拼写越南口语的一种通俗文字,适用于民间典籍,特别是用于宣传、启蒙和娱乐的读物。“六八”体韵文是用喃文在唐律的基础上,以民歌等口头文学为主要内容创造的一种新诗体。《二十四孝演音》喃译诗歌体现了二十四孝在越南被接受和改造的本土化过程,它运用诗歌形式,真正把二十四孝变成了越南本国的民间文学,成为民众自我教化的伦理依据,使孝道思想携带着统治阶级的印记融入民众的精神世界。

相对于喃文在民间的广泛应用,汉文通行于贵族、知识分子之间。李文馥等人以二十四孝为素材创作了近百首汉文诗歌^②,此种为故事题诗的情形并不只出现在越南,在中国也极为常见。《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及《日记故事》系统二十四孝都采用散文叙述配以诗歌颂赞的形式。元明之际的文人也往往为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孝图文配以诗歌,例如:元张宪《题王克孝二十四孝图》,即为王克孝所画《二十四孝图》题的一首五言长诗;^③元谢应芳《二十四孝赞序》:“今观郡人王达善所赞二十四孝,哀为一编,其间言孝感之事什有八九”^④,说明王达善也曾作二十四孝诗;明程敏政《复李宗仁太守书》:“承手教见示欲于迎春之日,罢无益之戏,别作二十四孝诗词,俾民歌之足见高明过人远甚”^⑤,知程敏政也有此类作品。由此可见,中国文人为二十四孝作诗赞已成为一种风习。越南知识分子创作二十四孝汉文诗,当是对这种风习的模仿和延续,也是其以身立范、自觉推行儒教意识的体现。

(2)根据书籍的编辑形式及抄写原则,《二十四孝演音》属于越南古籍最常见的几种书籍抄印于一册、合用一名的形式。具体可分为两类:

统一主题之合订:1813、1844、1820、R.296、R.1849;

无主题之杂抄:0903、1588、4952。

综观第一类,1813以启蒙读物为编辑或创作标准;其余以劝孝为标准,具有教化功能。而此类多为印本文献。印刷术的应用,扩大了书籍的传播范围并加快了书籍的传播速度。在儒学氛围中,越南政府历来重视刊刻具有教化功能的书籍。《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三十八载:

(嘉隆八年六月)北城总镇阮文诚进《大学衍义》书表略曰:“仰今圣上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兴太平,将举一世之人,归之有极。臣仰体德意,辘以其书付梓,工竣,印成一本,钦递进览,伏愿颁许印行,俾天下之人知圣所以表章之意,将家传而人诵之,于化民成俗之方,谅非小补云。”^⑥

①《提要》,第 xxiii 页。

②《提要》还著录了安丰训导郑辉简撰《二十四孝五言诗》二十四首,附于 3515 号《国音诗歌》下。

③张宪:《玉笥集》卷五,第 12 页,《粤雅堂丛书》(初编第二集),南海伍氏咸丰元年(1851)刊。

④谢应芳:《龟巢稿》卷十四,第 55 页,《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25 年版。

⑤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四,第 23 页,《四库全书珍本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

⑥转引自《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 104 页。

可推知,《大学》等儒学书籍的刊刻流传大都被认为是自上而下化育民俗的有力途径。《二十四孝演音》印本文献的大量存在及其启蒙、劝诫的编辑标准,明显地蕴含了知识阶层传播儒家文化、推动儒学教育的意图。

第二类以诗文杂抄为主,均为抄本。越南的抄本产生于印刷术通行的时代,大量抄本的存在表明,抄写依然是交流社会生活和传播文化知识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基层社会。^①诗文杂抄往往体现出抄写者的个人喜好和学习兴趣,抄写二十四孝作品表明了志学者对它的偏爱,是其在民间传播痕迹的显现,同时也是对前述上层推广行为的民间回应。

2、社会作用

由前文可见,上施下效的教化活动贯穿在二十四孝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二十四孝演音》与其他文献合并抄印的状况来分析它所肩负的传播、普及儒家孝义伦理的社会责任。

(1) 启迪童蒙

1857 中与《二十四孝演音》合订的三种文献中,《幼学越史四字》为四言体童蒙教科书,讲述自雄王到阮朝的越南历史;《三千字解音》和《明道家训》也均为启蒙教材。1820 中与《二十四孝咏》合订的《劝子勤学歌》是对儿童所言的劝学之辞。可见,《二十四孝演音》在越南被广泛用为儿童启蒙教材,这与郭居敬辑录《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以训童蒙”、《日记故事》用作童蒙教科书的初衷是相同的,在儿童发蒙时期就埋下孝道思想的种子,儒家文化化育之深可见一斑。

(2) 孝道劝诫

1844 中《二十四孝演音》与《文昌帝君劝孝文》合订,合称《劝孝书》。《文昌帝君劝孝文》托为文昌帝君“垂训”,论“孝为世间第一事”,以理明人;《二十四孝演音》讲述孝子故事,以事感人。理事结合,以达劝孝目的。1820 中与《二十四孝咏》合订的《孝顺约语》,是越南人所撰之四言体越南古代孝顺故事,以近人近事劝人行孝。

儒家文化中,孝道不仅是巩固血缘宗族的家庭伦理,更是治国的政治伦理。越南统治阶级也自觉地把孝道作为一种统治需求加以推广,《二十四孝演音》的传抄与刻印使孝道思想的传播在越南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互动,极好地完成了它的宣传与教化功能。然而,越南人之孝也有“大孝”与“小孝”之分^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统治者宣传孝道的根本目的在于国人忠孝于君、忠孝于国,从事亲之小孝推及报国之大孝,以有利于其统治地位的稳固,这与中国古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是一致的。

(朱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 《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 149 页。

② 孙衍峰:《儒家思想在越南的变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